

• 西方哲学研究 •

从启蒙理性的缺陷看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

张庆熊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实证主义自命为启蒙理性的审判官,并确实意识到启蒙理性的缺陷,但他们把启蒙理性所主张的“知识就是力量”片面化了,进而把一切科学活动简化为如何发现规律和进行预测的活动,把所有人类行为的目的简化为通过控制自然达到维持生存的目的,并在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名义下,拒斥一切按照人类崇高理念改造社会现实的主张。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这是由于启蒙理性掉入自己所编织的工具理性之网的缘故,只有进行理性的批判才能跳出启蒙的陷阱,完成理性的辩证发展过程。直至今日,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依然徘徊在革命的理想主义和经验的实证主义之间。如何在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和克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的革命精神之间寻求一个适度的平衡点,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启蒙理性 模仿 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

今天谈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个标志性论断是:反形而上学是实证主义的目的,证实原则是实证主义用来区分科学和非科学,从而达到反形而上学目的之手段。这一论断固然不错,但对于实证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形而上学的解说语意不详。形而上学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而导致实证主义要起来反对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条现在多少被人遗忘的途径是从实证主义产生之初的19世纪后半叶欧洲的政治和社会^①的局势说起,从启蒙思潮陷入的困境说起。

一、以实证清凉启蒙思潮的狂燥

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源于对启蒙思潮的反思。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高举理性、自由和进步的大旗,反对宗教的蒙昧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推动社会变革。欧洲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也体会到了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从客观的进程看,英国的社会体制的过渡还算平稳,法国就不同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是惨烈的社会动荡、暴力恐怖和内外战争。在整个欧洲,作为第三等级的工商业主与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拥有巨大财富的资本家与赤贫的工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受到封建领主和资本双重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农民暴动,是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实证主义思想家反思如下问题:

1. 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主张人要用自己的理性作为审判一切的最终法官。但是为什么在这种理

[收稿日期] 2013-04-16

[作者简介] 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写作得到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项目“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型及其哲学基础”(项目批准号:2011RWXKZD008)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项目“现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型与马克思主义”(项目批准号:13JJD720005)的资助。

① 我们今天谈到实证主义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语言和逻辑的问题,实证主义似乎离社会现实很远。但是早期的实证主义者非常关心社会问题,在他们的论著中社会学说占有很大篇幅,他们主要关切的是如何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可以说,早期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如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首先是社会理论家,“社会学”的概念最初就是由孔德提出的。

性思潮推动下发生的社会革命产生了如此众多非理性的社会现象? 究竟什么是理性? 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理性来组织社会? 2. 启蒙思想家宣扬人类历史在不断进步。但究竟什么是进步呢? 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之类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进步吗? 还是人类历史要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 按照可信赖的准则来衡量, 才能谈得上进步? 3. 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的实现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准的关系如何? 离开了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能落实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吗? 如果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的实现必须与社会发展状况相协调, 那么应该怎样来调整人的社会关系呢?

面对第一个问题, 实证主义认为, 理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错误在于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认识不确切。理性的要义不仅仅是合理的推论, 而且在于对理论的有效性和真假进行检验。启蒙思想家的许多社会理论听上去十分合理, 但却无法检验。启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 并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学说来论证他们的社会主张。其中较为流行的是: 人生而自由平等, 后来由于互相争斗、私有财产的出现等原因导致专制主义和社会不平等。因此, 需要推翻专制政体, 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 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实证主义者质问: 你怎么知道人生而是自由平等的呢? 你有什么证据说人由于互相争斗、私有财产等原因而导致人失去自由并变得不平等呢? 你凭什么方法能证明人类社会将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呢?

通过对照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理论, 实证主义者发现它们之间有如下重大差别: 自然科学探究自然现象间的规律或法则, 这些规律或法则是能够被经验检验的, 从而能够判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假和优劣。启蒙思想家关心的不是社会现象间的规律, 而是他们信以为真的美好的社会理念。他们建立的社会理论虽然娓娓动听, 虽然也有一步一步的推理, 但是以虚构的假定和想当然的原理为依据, 并未提出去检验这些假定和原理的方法。因此, 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论依然是形而上学的理论, 还没有达到科学理论的水平。

由于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理论是不可检验的, 因此当启蒙思想家要以理性作为最终法官来审判各种社会理论时, 其结果不可避免地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各派政治势力按照各自的利益来鼓吹各自偏好的理论, 从而在理性名义下的社会改革不免沦为实质上非理性的血腥斗争。

为克服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和社会动荡, 实证主义者希望使得社会理论从形而上学的学说上升为科学, 这就要在社会理论中引入“实证的标准”: 那些论述社会现象间的规律或法则只有经经验检验, 才配得上称为科学的社会理论。由此, 能以科学的社会理论来指导社会改革, 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 赢得真正的社会进步。

面对第二个问题, 早期的实证主义者倾向于赞同启蒙思想家有关社会历史进步的观点, 但责备启蒙思想家的“进步观”只停留在观念的层次上, 没有提供“实证”的证据。这犹如以往一些人主张生物是进化的, 但没有提供生物进化的证据一样; 直到达尔文收集到一系列生物进化的标本, 生物进化论才从观念转变为一种科学学说。有鉴于此, 实证主义者认为必须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证据, 才能真正谈论人类历史是否在进步。

实证主义者寻求发现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资检验的特征, 并以这些可资检验的特征为基础, 揭示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和人的思想方式的演进线索。人类历史演进有一些较为容易发现的外在特征, 以此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时代, 如: 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以蒸汽机为开端的机器时代; 与此相应, 又可从另一个角度划分: 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等。对于这样的历史递进, 有考古资料为证据。对于社会结构演进线索的发掘, 则较为困难。实证主义者企图从家庭结构(亲缘关系)、经济结构(财产支配关系、商品交换关系)、政治结构(权利关系) 的角度进行考察, 并联系到这些社会结构与石器、铁器、蒸汽动力机在生产中的使用的关系。实证主义者关注证据收集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除了从历史书上找证据外, 还对原始部落的社会调查为依据。对于人类思想方式的演进, 早期实证主义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三个阶段说”: 1. 神学阶段, 以神灵意志来解释

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2. 形而上学阶段, 以理性原理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3. 科学阶段, 以能被经验证实的规律或法则来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①

实证主义者把人类社会进步的外在特征、内在结构和思想方式的演进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 在使用石器、铜器的狩猎和原初的农耕时代, 人类认识受到神学思想方式的支配; 在铁器的农耕时代, 人类认识以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为主; 在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代人类认识进入科学的阶段, 实证的思想方式成为主流。

早期的实证主义者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外在特征、内在结构和人的思想方式的类型的研究还相当粗糙, 但他们确立了一条实证的原则, 即社会理论必须以可供经验检验的证据为基础。在他们看来, 有了这条原则, 社会学说就能摆脱形而上学思辨的形态, 迈向科学的理论; 有了这条原则, 任何社会学说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 将随着新发现的资料和新的证据而被修正或推翻; 有了这条原则, 社会理论的进步才真正有据可依。

面对第三个问题, 实证主义者思考社会理念的实现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各类启蒙思想家大致都推崇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 但在其优先顺序的配置方面有所分歧: 有的把“自由”放在首位, 主张只要实现自由贸易、自由经营、自由舆论, 自由选举就能带来经济活力和思想活力, 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有的把“平等”放在首位, 主张只要实现人人劳动、分配平等、社会地位平等, 就能解决所有丑恶的社会问题, 实现社会的正义; 有的把“博爱”放在首位, 提倡以“人道”为根基的“公民道德”, 认为当人道主义的“博爱”取代以“神灵”为救世主的宗教愚昧后, 就能实现人间的真正幸福。

实证主义者反思自由、平等、博爱的关系。他们认识到不能空谈理念本身的好坏, 而必须结合现实的社会处境, 考察理念实现的可能性及其互相间的配置关系。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增加经济活力, 因为它符合人性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点, 但也会带来贫富两极分化, 导致实质上的社会不平等, 增加社会冲突的因素。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实现分配的平等, 有助于克服贫富对立, 但不利于社会发展所需的专业化分工和经济发展所需的激励手段。实证主义者主张对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做实证的考察, 即不是从理念方面而是从实际效果方面评价社会政策的有效性。由于实证主义的这一立场, 使得他们倾向于社会改良而不是社会变革, 因为社会改良的政策效果较为明显, 而以理念为指导的社会变革往往导致许多无法预料的负面结果。

实证主义者并非没有注意到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他们从一开始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社会发展导致了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分化, 整个社会靠什么力量才能维系起来呢? 他们认为, 不应当也不可能再通过崇拜神灵的宗教来主持社会的道德, 但他们又想建立一个新的“尘世”、“人道”的实体, 发挥与以往宗教同样的道德教育功能。他们设想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能承担起道德教育的职责, 他们的工作能发挥类似于宗教的维系社会和谐的功能。“科学家”和“艺术家”能否充当教士般的“精神领袖”呢? 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培育的问题能否以实证的方式解决呢? 这一直是摆在实证主义者面前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以逻辑和语义分析担当科学理论的建构工作

要谈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发展脉络, 我觉得最好从英国启蒙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有关知识形成的“蚂蚁”、“蜘蛛”和“蜜蜂”的譬喻说起:

^① 孔德甚至把个人思想成长的过程也与这种“三阶段说”联系起来。“个人和其种族的出发点是相同的, 一个人的心智的发展阶段相应于人类心智的历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只要回顾自己的历史, 就能知道, 他在童年时代是神学家, 青年时代是形而上学家, 成年时代是自然哲学家。人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都能自己来证实这一点。”参见: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of Auguste Comte*, Freely translated and condensed by Harriet Martineau (New York: Calvin Blanchard, 1858) 27。

那些处理科学事务的人不是经验主义者就是教条主义者。前者像蚂蚁一样,收集使用所找到的一切;后者像蜘蛛一样,用自己吐出的丝结蜘蛛网。蜜蜂则在两者之间,蜜蜂在花园和原野上穿梭采集花蜜,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消化合成。真正的哲学工作类似于蜜蜂,因为它既不完全或主要依赖于心灵的力量,也不只把从自然的历史或机制的实验中所得到的一切堆放在记忆里,而是在理解中加工和转化它。因此,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寄希望于把这些能力(实验能力和理性能力)比以往更紧密和精纯地结合起来。^①

培根通过上述譬喻,形象地刻画和预示了近代西方各类知识论的特征和发展方向。近代西方哲学可以分为“经验论”(empiricism)、“唯理论”(rationalism)和“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三类。经验论的主要特征类似蚂蚁的工作,把知识当作经验的收集和积累的结果;唯理论的主要特征类似蜘蛛的工作,把知识当作心智按照原理推导的结果。培根主张,科学知识的建构应该是经验与理性相结合的产物。经验是依据,理性是推导的能力。心智通过理性把实验所得的经验材料在理解中加工整理,转化为科学理论。但究竟什么是经验,什么是理性,以及理性如何组织、整理经验材料等问题,培根并没有详细说明。培根提出了“蜜蜂”的譬喻,但没有说明蜜蜂是怎样把花粉转化为蜂蜜的,即没有说明理性究竟是怎样把经验转化为理论的。康德的先验论可谓尝试解答培根的“蜜蜂”功能的一种方式。按照康德的理解,心智通过先天的感性形式(时空)和知性范畴(因果等)来组织、整理经验材料,使之上升为有系统的知识。

实证主义者不同意康德的先验论。他们认为,心智对经验材料的组织与整理确实要通过时空、因果等认知的形式或范畴,但是这些认知的形式或范畴依然来源于经验,其有效性要经受经验的检验。心智组织与整理经验材料的方式主要是心理的联想、逻辑的归纳和分析,心理的联想律是经验的规律。对于逻辑的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是否是经验法则的问题,实证主义者之间历来有争论。有的主张逻辑的归纳法是经验的方法,而逻辑的演绎法则是纯形式的分析方法,与经验无关。从而有必要严格区分经验命题和分析命题;经验命题要受经验检验,而分析命题则要靠逻辑分析来证明。有的主张,不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归根到底都依赖于经验,因为对逻辑推论方式的有效性的辨别最终要依赖于经验,正如工具的有效性要受经验检验一样。尽管实证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在对范畴和逻辑形式的形成及其与经验的关系问题上有不同的解说和争论,但基本倾向是认为它们不是先天的认知形式,反对康德的先验论。

总的来说,实证主义是经验主义的延续,企图用经验主义的方式说明培根提出的心智如何加工和转化经验材料的问题。实证主义者主张,一切真正有意义的知识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必须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实证主义所说的经验主要是指感性经验。实证主义意识到经验包括感性经验和情感等内知觉的体验。但实证主义认为只有感性经验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来源,因为感性经验是公共可观察的,而内知觉的经验则不是。每个人的感性经验虽有差异,但大体上还是相同的。不同的个人在色、声、味、触等感觉方面略有差别,个别的人甚至色盲、眼瞎、耳聋,但正常人的感觉还是基本相同的。而且,这些主观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建立客观的准则加以克服,如建立统一的度量标准和度量工具。由于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感性经验是公共可观察的,并能通过测量加以量化,科学所需要的客观性和精确性就能建立起来。

实证主义属于经验主义的传统。比起以往的经验主义来,实证主义更加着重对理论的经验证实,并强调这种证实必须是公共可观察的,必须具有主体际的有效性。实证主义否认任何先天有效的原理,反对通过纯粹理性思辨建立知识体系的主张。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因为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没有经验基础而单靠思辨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科学与形而上学相反,科学理论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并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

^①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55, Aphorism 95) 126.

实证主义的方法有三个要点: 1. 确定经验事实; 2. 发现现象间的齐一性, 建立有关现象相继发生的规律性的理论; 3. 从理论中推导出那些能够对未来发生的现象加以预言的经验命题, 并通过经验事实验证该理论是否正确。在建立有关现象间的规律的理论 and 从理论推导出可供检验的观察事实之间, 逻辑和语义分析发挥着重要作用。逻辑和语义分析解决科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 而经验检验解决科学理论的真假问题。在实证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逻辑和语义分析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鉴于这种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富有成效, 实证主义者就想把它应用到社会领域中去。他们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区别, 但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更加复杂一些, 往往受到人的动机的影响, 带有人主观价值判断的色彩, 但从总体上讲社会现象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齐一性, 或在诸社会现象中有一些具有齐一性的事实背后主导那些初看起来没有齐一性的现象。因此在原则上, 在自然科学中普遍适用的实证主义的方法经过一定的调整之后可应用于社会领域, 找到那些支配社会现象的规律, 从而使得有关社会的理论能够成为实证的科学。

实证主义有很长的发展过程, 可以说经历了三代。第一代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为代表。第二代以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 和理查德·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 1843—1896)、赫尔曼·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 为代表, 他们的学说也被称为马赫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第三代以莫里兹·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1936)、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1881—1970) 和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 1882—1945) 等人为代表, 他们的学说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在往后的发展中, 实证主义的名称不太被其后续者使用, 因为他们感到实证的原则过于狭隘, 他们更愿意称自己的哲学为分析哲学。

第一代实证主义阐明了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 并把这些基本原则与当时流行的进化论的思想相结合, 提出了社会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思想。第一代实证主义哲学家普遍关心社会问题。在他们那里哲学和社会学还没有分家。他们兼具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在其后, 社会学越来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所以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实证主义哲学家谈论社会学的问题就较少, 但他们的方法论继续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社会学”的概念首先是由孔德提出的。孔德把按照实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有关社会现象的理论称为社会学, 其任务是研究和发现社会现象的“不变的规律”。他参照物理学的概念, 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个部分。社会静力学研究静态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社会动力学研究社会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 研究社会进步的动力和进化的过程。斯宾塞则把生物学的概念应用于社会学, 认为社会如同一个生物有机体, 社会分工如同动物机体各个器官的分工。生物要维持有机体内各成分的均衡, 要调节营养的分配, 社会也要安排各社会成员的分工和调节他们的利益。生物通过生存斗争获得进化, 各民族、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也将通过它们之间的生存斗争获得进化。系统地阐述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则推穆勒。

第二代实证主义侧重于心理学的感觉分析。鉴于第一代实证主义没有深入探讨究竟什么是经验的问题, 第二代实证主义者结合当时发展起来的神经生理学的理论对感觉经验做深入的分析, 认识到视觉神经、听觉神经接受声波和光线的刺激而形成的感觉经验并非像白板一样直接反映或摹写外部事物, 而是像符号一样象征性地传递外部事物的信息。在第二代实证主义者看来, 培根所说的在科学研究中的“蚂蚁”的工作并非简单的收集客观的材料, 因为“感觉经验”已经或多或少融合了主体和客体的因素。因此, 在有关判断经验究竟是主观还是客观的问题上, 他们主张“要素一元论”或“经验中立论”, 认为存在一些超越心物对立的中立的经验要素, 它们在一种联系中可以是物理的东西, 在另一种联系中可以是心理的东西, 主张实证科学应该以这样的经验要素为可靠的起点。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严厉批判了第二代实证主义者, 认为他们所说的

“要素一元论”或“经验中立论”实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是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在今天,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这些党派之争,而应实事求是地评价第二代实证主义的功过。我觉得,他们结合当时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感觉经验所做的科学分析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代实证主义注意到语言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培根说科学研究要像“蜜蜂”一样结合“蚂蚁”的收集材料工作和“蜘蛛”的理论建构工作。但第三代实证主义者发现,不论是收集材料还是理论建构,都离不开语言。我们通过语言表达事实,通过语言建构理论。语言本身有其规则,语言的意义除了描述事实外,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用法。不澄清语言的句法和语义,科学研究中就会留下许多不清楚的地方。由于第三代实证主义者引入语言问题,在哲学史上就称为“语言学的转向”。在他们中形成人工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前者结合当时新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企图为科学理论配置精确的人工语言。他们严格区分逻辑命题和经验命题,主张对于逻辑命题采用逻辑证明的方法进行确证,对于经验命题采用经验的证实的方法进行确证。他们认为,科学理论应以经验命题为基础,通过逻辑命题加以联络,建构表述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并由该体系中推导出来的预言经验事实的命题来检验。后者主要关注日常语言,分析日常语言的用法,分析语言与生活形式的关系,分析形而上学是如何因为误解语言而失误的。由于第三代实证主义的这种语言学的转向,在往后的发展中“语言分析哲学”或“分析哲学”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从而成为刻画该学派新发展的一个专名。

三、实证主义与启蒙辩证法

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在当代遭到许多哲学流派的批判,其中最深刻和最严厉的批判者当属法兰克福学派。如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合写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就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实证主义的兴起与启蒙思潮的失误有关,而克服实证主义的偏颇有赖于启蒙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按照实证主义者的看法,启蒙的失误在于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理念,为克服启蒙的狂燥,要加入实证的清凉剂。按照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看法,启蒙的理性是支配自然的理性,而为支配自然,必须顺应自然,按照自然的法则办事。这样,实证主义的思潮就流行起来,其结果是只看到现存的事实及其法则,看不到或无视生活的意义,屈从于现存的状态及其法则,看不到超越它们的可能性。人本应当控制自然,结果是屈服于自然,使得自己沦为一种无意义的自然之物,使得自己物化了,这就是启蒙的陷阱。为了从这种陷阱中自拔,就必须批判工具理性,批判实证主义,完成启蒙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通过古希腊史诗《奥德赛》(Odyssey)来阐发他们有关启蒙辩证法的思想。在《奥德赛》中,自然就像一个既诱人又使人沉沦的海妖。人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总想通过操控自然而从自然中获取更多的东西,然而总是受到自然的捉弄。在古代,人把这归咎于命运的捉弄,相信有看不见的神灵或妖魔在操控人的命运。古代人祈求神灵保佑,希望通过献祭和法术来降服妖魔,消除灾祸。启蒙理性旨在用知识使世界摆脱魔力,祛除神话,然而,就其想征服自然这一目的而言是相同的。当然,古代人对于自然和人的态度与启蒙后的现代人有很大不同。古代人把自然视为有生命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并在这种生命体中看到人和世界的意义。在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我们既可看到对人在自然中的拼搏精神的赞叹,又可看到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并通过人与自然的这种复杂关系来启明生活的意义。然而,由于启蒙理性的祛魅,自然失去了生命意义的光彩,自然就是服从自然规律的自然之物的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适者生存”的关系。人也是自然之物,人的本性就是自然之本性。人生的目的就是维持自身的生存,而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就必须适应自然的条件,遵循自然的法则。发现自然法则和遵循自然法则成为科学的唯一目标,除此之外都是非科学的没有意义的东西。这样,人的生活价值和生命意义也被当作像神话一样的东西被排除出去了。实证主义就是这种启蒙理性的极端表现。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写道“屈从于模仿(Mimesis)的理智(Ratio)不只是它自身的反面。它本身就是向死亡的模仿。当主体精神

一味进行僵死的模仿,从而把自己的灵性消解后,它也就消解了自然之灵性,完全沉沦于僵死之物中。为了进行统治而模仿,人就不再是人,而成为拟人化的东西。奥德赛的诡计就是通过这种为统治自然而顺应自然的方式实现的。”^①

我认为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这一批判切中实证主义的要害。实证主义者主张严格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他们认为,事实判断是实然判断,是能够被经验证实的;价值判断是应然判断,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因而,价值判断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这一观点确实对当代社会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强调,尽管在选择研究课题时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作用,但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要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社会科学不是去启发人们应当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事实是什么,以及怎样对将发生的现象进行预测。“知识是为了预测,预测是为了控制,而控制就是权力。”这是孔德以来实证主义的中心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指责实证主义的这种观点是工具理性的观点,主张社会科学应该关心价值问题,社会科学具有批判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弘扬社会正义、帮助人获得自我解放的意义。

回顾启蒙以来西方社会思潮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好的社会理念激发人们社会变革的热情,但也经常导致不切实际的破坏性的盲动。而为了纠偏这种乌托邦的浪漫主义,又会强调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科学精神。然而,我们往往分不清这种科学精神与实证主义的区别,从而让市场的手牵着鼻子走,丧失了社会正义感,在承认社会现实的名义下,容忍了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何在遵循客观的历史规律和保持革命的批判态度之间寻求一个适度的平衡点,是当代社会理论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责任编辑 晓 诚]

^① Theodor W.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ischer-TB, 2000) 75.

Key word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China model; unsustainable; vulnerable determinism

Marx's Viewpoint of Practice: Horizon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GUAN Chun-ling

(*School of Marxism ,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 Harbin 150040 , China*)

Abstract: Marx's viewpoint of practice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ought , which has defined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towards angle of practical production , domain of capital critique and enlightenment of social revolution. By all-round analysis on intrinsic nature of capital production mode with ecological destruction , apply of Marx's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 will contribute to depth cognition for essence and roots regarding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is. Furthermore ,we can reflect on the ideological limitations of moral practice view of western ecological philosophy , and clarify that eco-friendly economic system is social background support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Marx; practice; production mode; ecological philosophy; capital critique

Reviewing the Problem Awareness of Positivism from the Defects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ZHANG Qing-xi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 Positivists proclaimed themselves as judge for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and indeed realized the defects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 but they one-sidedly developed the points of view that “knowledge is power” advocated by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They simplified all scientific activities as how to discover the laws and to predict , and all human purposes as subsistence by means of control of nature. In guidance of this principle they rejected all schemes to transform socie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ble human ideas. According to Frankfurt School , this came down to that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fell into the web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eaved by itself , and only through rational criticism can we jump out of this trap to complete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 Until today our thinking mode to deal with social problems is still hovering between revolutionary idealism and empirical positivism. How to seek an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following objective law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overcoming unjust social phenomenon is still an urgent problem in front of us.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mimesis; positivism; critical theory